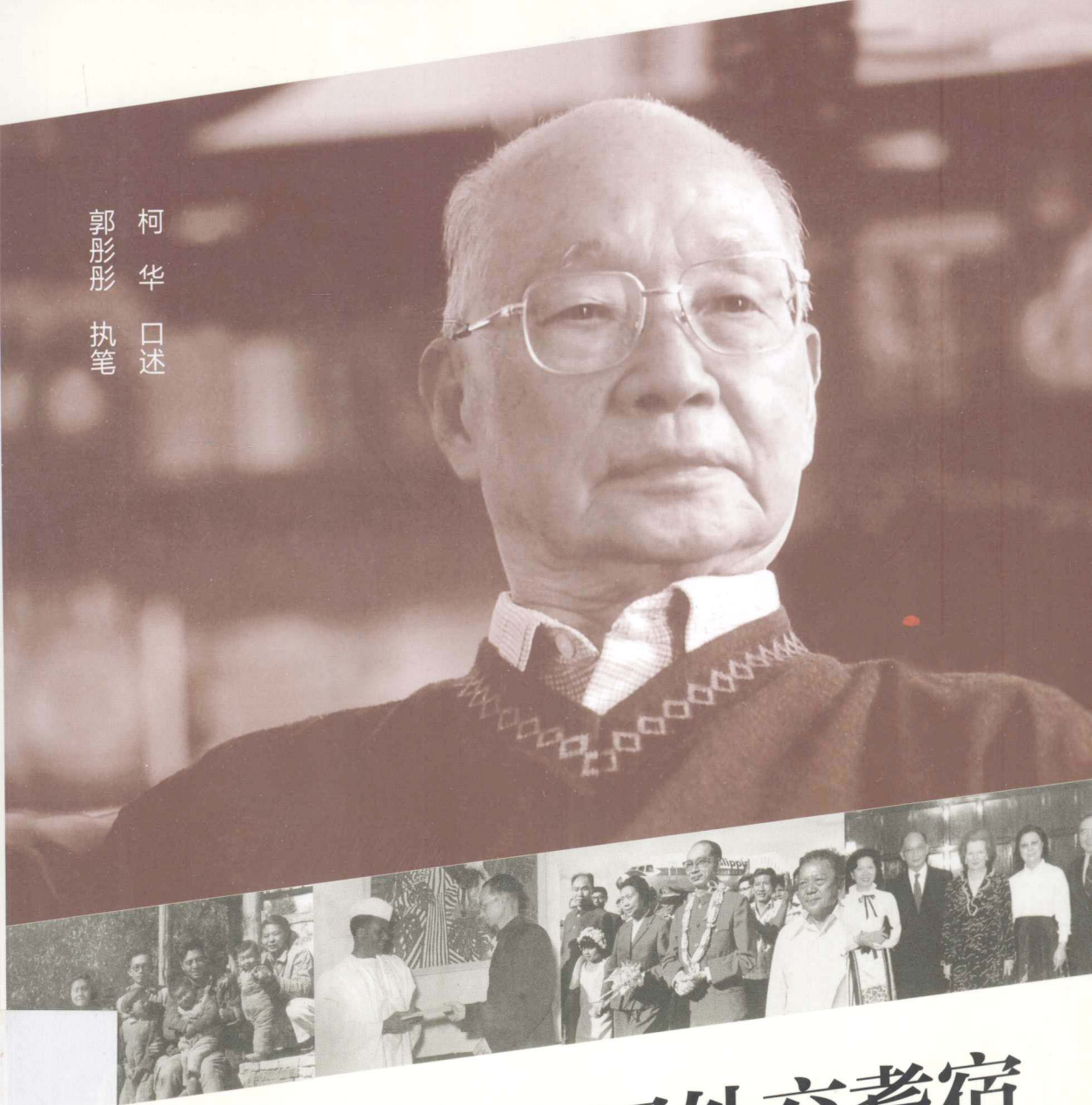


柯华 口述  
郭彤彤 执笔



# 新中国外交耆宿 柯华95岁述怀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3067732

K827  
1878

# 柯中国外交耆宿 柯华95岁述怀

柯华 / 口述  
郭彤彤 / 执笔



K827  
1878



北航

C1675218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 柯华口述；郭彤彤执笔。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39-5665-2

I. ①新… II. ①柯… ②郭… III. ①柯华 (1915～) — 传记

IV.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1446号

## 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口 述 柯 华

执 笔 郭彤彤

责任编辑 董瑞丽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http://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1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665-2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目 录

- 1 故乡  
1915 年 — 1935 年
- 13 救亡·北平  
1935 年 — 1937 年
- 47 西北  
1937 年 — 1954 年
- 85 外交部首任礼宾司司长  
1954 年 — 1956 年
- 103 正在觉醒的大陆：非洲  
1956 年 — 1964 年
- 175 “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 1976 年
- 239 在英国及后来  
1978 年 —
- 303 结语  
2012 年早春
- 308 柯华简历
- 310 后记

新中国外交书宿柯华95岁述怀

# 故乡

1915年—1935年



## · 1 ·

1915年12月，我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县里湖镇。

里湖镇在广东潮汕地区算是有点历史，明代时，这里商业比较发达，一直延续到清中期。

里湖商业发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颇具地理区位优势，它毗邻榕江，东面和梅塘镇接壤，西面与揭西县坪上、钱坑相连，南临梅山镇，北面是榕江南河，同揭西县金和镇隔河相望。镇内有榕江、火烧溪、西门溪、引榕渠四条水穿流环绕。

明代时，在石碑溪、火烧溪之间修建了一座龙门桥，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叫“鲤湖镇”，后来简写成了“里湖镇”。

明、清两代，里湖镇的商业情况比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其中有一个大背景不容忽视，就是里湖的商业始终是在农耕社会的框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一旦农耕文明的社会框架遭遇到工业文明的冲击，它就垮了下来。具体地说，就是穷人多了，农耕社会中的商业形态

萎缩，大部分人家退守到单纯的农业生产。

我很小的时候，体会最深或者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家里穷——大杂院里有一间房子是我们家的，住着父亲、母亲、大姐、大哥、弟弟六七口人。房间里除了床之外，就是一个织布机。我估计这个织布机算是我们家唯一在当时与商业发生关系的纽带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妈妈织布除了供家里人穿衣之外，还会将多余的布拿出去卖。

20世纪初，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文明已经进入鼎盛时期，我妈妈织的土布和洋布根本就没法比，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质量，都比不上洋布。

当然，我妈妈不懂这个，她依旧每天晚上织布，点不起煤油灯，我也从来没有在家里见过蜡烛，就点一支香。一支香的亮度怎么能够照明呢？但确实如此，妈妈每天都点一支香织布。

妈妈织布，爸爸从事农耕，父母皆为勤勉辛劳之人，但却始终无法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平常日子，舍不得吃肉，就买二两猪油挂到门口。我小，嘴馋，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仰着脖子舔那个挂着的猪油。弟弟也嘴馋，我干脆给弟弟抠下一块喂到他嘴里。弟弟吃下去，没过多大一会儿，肠胃受不了，吐得一塌糊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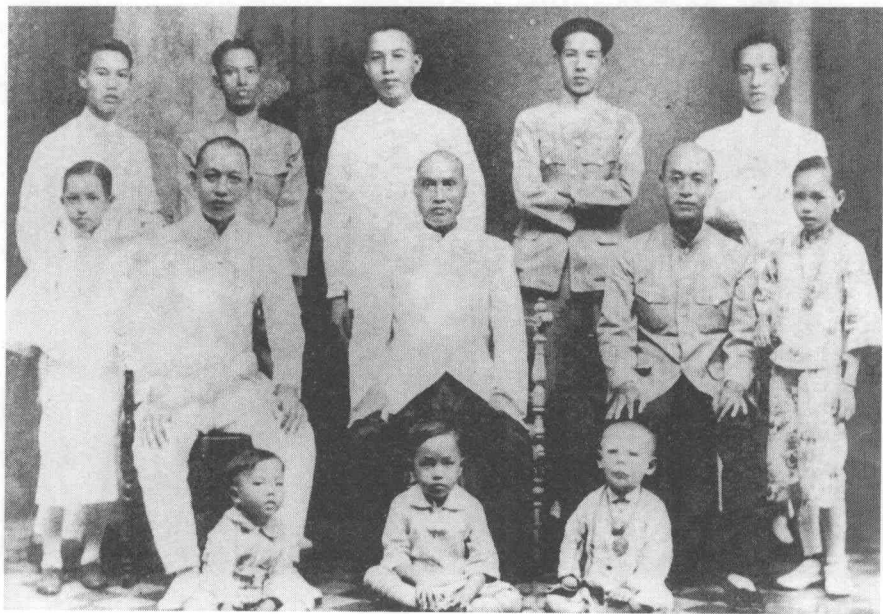
我们家这种穷在里湖不是个别现象，大家都穷。穷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山东、河北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穷，很多人闯关东，到东北去谋生。我们那儿的人去哪里呢？去南洋，漂洋过海到南洋讨口饭吃。

久而久之，漂洋过海到南洋找饭吃的人多了，普宁就成了侨乡，大概有一多半的人家会下南洋。就拿普宁的里湖镇来说吧，一共10万人多一点，就有4万的侨胞，比例很大了。

当时家里穷得没法子，我父亲也下南洋，去现在的马来西亚。

父亲到马来西亚大概是1917年前后，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到马来西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密切得很——马来西亚最负盛名的橡胶是热兵器时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战备物资，火得很。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期，这10多年中，南洋



柯华的父亲林志乐(二排左二)与其父亲林先典(二排左三)及兄弟(二排右二:林志明, 后排左起:林志橙、林志勇、林志见、林志知、林志禄)等合影

出现了一批通过做橡胶生意发了大财的华人,像华侨巨子卢文仪,他的橡胶园里仅雇佣的工人就有几千人之多。

我父亲刚到马来西亚,通过家乡的亲族关系,给一个号称“马来西亚第二大富翁”的人工作,不过不是在橡胶园里,而是在他开的一家杀猪铺子里当伙计,做些杂事,后来管账,每个月挣17块钱,寄回家来10块钱。有了父亲寄回来的10块钱,家里的生活这下子好转了。

后来,父亲成为了杀猪铺子的经理。父亲做事有个特点:勤勉。他把杀猪铺子经营得相当好,大富翁送给他一片橡胶园,父亲挣了钱就往家里寄。

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有了钱就要盖房子。父亲经营橡胶园挣了钱,我们家也盖了大房子,从大杂院里搬出来。家乡人把这种大房子叫“四点金”,能盖得起“四点金”可是了不起。

什么叫“四点金”呢?有时候人们会把它与北京的四合院做对比,



柯华当年住过的房子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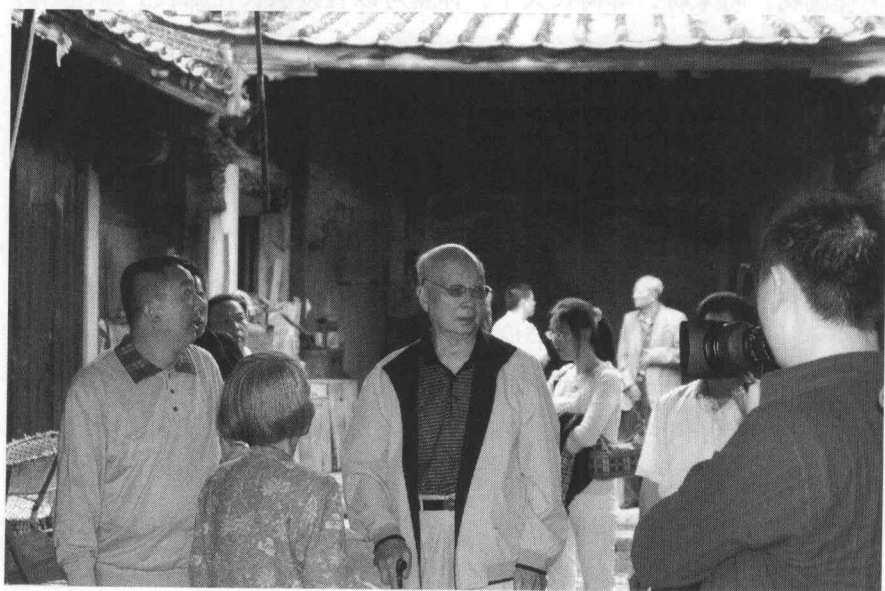
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比对性不大。因为从“四点金”的得名来看,它基本上算作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居住方面最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一种建筑样式。

“四点金”与四个阁仔有关。“阁”很古老了,在汉代的文献中就有记载,指堂的东、西两侧和堂毗邻、平行的房子。“四点金”中的阁仔刚好和文献记载一致。

现在我们说到“阁”是指类似楼房的建筑物,其功能主要是指供远眺、游憩、藏书和供佛之用,但过去主要指的是女子居住的地方,“闺阁”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汉乐府《木兰诗》中就有关于阁的叙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我们家乡非常遵循古训,阁仔多为家里的女孩住和女孩做女红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儒家社会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女孩子应该足不出户,家里来客人时需要回避,但阁仔四个门中正好有一个门面向大厅前的走廊,所以门上要吊一个竹帘,客人来了,就把帘子放下来,



2007年11月1日，92岁的柯华重返故里，忆及往事，感慨万千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而女孩子们却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从某个角度来解释的话，阁仔也是女孩子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众所周知，女孩子在中国社会被叫做“千金”，而阁仔主要是女孩子居住和做女红的地方，因而也被叫做“千金阁”。

因“四点金”里面有四个阁仔，故被人们称为“四千金”，“千金”与“点金”有谐音，慢慢地就成了“四点金”。

我家的“四点金”终于盖好，就要搬家了。搬家可不是随便什么时候想搬就搬的，讲究颇大，一定要选良辰吉日，我们选的是晚上搬家。

我那时候岁数小，跟着家里的大人后面忙活，很开心。

三姑见我跟着忙活，便拿来桂圆给我吃。我一吃，不小心把桂圆的核咽到肚子里了，这下可不得了了，我吓得“哇哇”大哭。

三姑赶紧哄我：“不要紧！不要紧！吃下去没事的，它会在肚子里长出桂圆树。将来呀，等树长大了，你就可以直接从长在脑袋上的桂圆树摘桂圆吃了。”

我听后不哭了，并且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盼着桂圆树从肚子里长出来。

其实呀，从我记事起，因为父亲在南洋的关系，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错了，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基本上没有再经历窘迫的日子。

母亲持家非常勤俭，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起来之后，她常在乡里做些修桥、补路、救济穷人的事情。父亲打算买一辆汽车，母亲一听，和父亲闹，坚决不让买。总之，母亲很节俭。

父亲要买汽车这个事情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觉得父亲买汽车是资本家所为，向组织谈到家庭出身问题时，认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虽然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都很积极，也比较早，但因这个问题向组织讲了，也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我到1938年才入了党。

## · 2 ·

虽然这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错了，可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整个社会会有多好。

在我小时候，对社会上的土匪、军阀的了解都是通过耳闻得来的，其间没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都是些碎片式的记忆，脸谱或者说符号的意义更大一些，当不得信史，但我清楚脸谱或符号对我幼年时认识当时社会的作用亦是关键所在。

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乡下，散兵游勇时常出现，土匪、乞丐也不少。我在街上亲眼见过抓壮丁，人家正在赶路，过来两个当兵的把人家一绑就拉走了，也不让人家跟家里说一声，就去当兵了。

土匪更可怕。有个土匪叫“王老五”，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把人家的小孩抓走，让孩子的家里人拿钱去赎，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钱还没有送到，王老五就把抓去的小孩煮熟，放到小孩的家门口。

普宁乡下，家家都有粪坑，很深很深。有一天晚上，王老五走夜路，不小心掉到粪坑里，被人发现后，拉出来往死里打，由此可见老百姓多么痛恨土匪。

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最初没有进新式学校，而是去读私塾。

我在私塾读书，考试永远是最后一名，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轮猪，认为我笨得像那头轮流养的猪。

我们那里穷得一家养不起一头猪，于是就三五家人轮流养一头猪。

上了一年还是两年私塾，反正我记不清了，我去镇上的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是2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

上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对社会有了点朦胧的意识，主要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家乡驻军的一个师长，他下令把许多麻风病人赶到一个村子，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全部杀死，再浇上油烧，很残忍。

第二件事情，1927年9月和10月，澎湃在海丰县、陆丰县领导农

民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陆丰县离我们普宁不远，挨着的。澎湃搞苏维埃不简单，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国民党过来镇压，到处杀人，我有五六个同学，比我大几岁，也是10多岁的娃娃，我记得名字的有两个同学，一个叫陈志桥，还有一个叫李存嘉，他们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了，说是共产党。

我那时候年纪小，还不懂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我就是很气愤，这些同学平时表现很好，怎么能被枪毙了呢？我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澎湃在广东的海陆丰苏维埃最终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共产党的革命转入了相对来说的一个低潮阶段，有好多共产党人去了海外。

这时候，我和母亲，还有弟弟，从汕头出发，坐轮船去槟榔屿和父亲、叔叔、姐姐团聚。

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第一次坐大轮船，轮船的名字我还记得，叫“万福士号”，是当时汕头去南洋最大的轮船。我前面说过，母亲很勤俭，买了底舱船票，睡大通铺。

船在大海中航行数昼夜，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总有一种鱼好像是跟着船在游，这些鱼在船舷两旁不停地跃出水面，颇为神奇。

我们乘坐的“万福士号”到了新加坡港，停一天，我们没有上岸，一直待在船上。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看样子比较穷。

“万福士号”是大轮船，我在甲板上玩，许多小船围着“万福士号”，小船上的人衣衫褴褛，他们冲着大船或磕头或作揖，讨饭讨钱。有些好心人就把钱抛给小船上的人，我也向妈妈要了铜板抛给小船上磕头作揖的人。“万福士号”很高，把铜钱抛下去不是都能落在小船里，落到海里的也有很多。这些小船上的人一见铜板掉到海里，敏捷得很，跳到海里，潜下去就能捞起铜钱。

我父亲当时在槟榔屿。槟榔屿是马来西亚的十三州之一，华人多在此聚居。我们到了之后，父亲送我去居林学校读书。后来我才知道居林学校有从国内来的共产党。

我在居林学校读书大概不到两年，该上初中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汕

头，在大中中学念书。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英文也好。

有一次英文考试，不知道怎么搞的把卷子丢了，老师看我平时英文不错，要给我99分。我不愿意，主动说“我再考一次”。老师把卷子发给我，一考，居然得了100分。

我在汕头大中中学读到初二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关东军两个中队才多少人？向沈阳北大营开炮进攻。北大营里有进口的坦克，武器装备比日本关东军的要好得多，军官一级一级往上报告请示开不开枪？结果大家都知道，不抵抗。

全国震动呀！全民各界要求政府抗日，情绪激烈，特别是在学生中的反响之强烈前所未有的。

当时南京的学生，后来是北平南下的学生请愿团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集会请愿的时候，把外交部长王正廷，还有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以及南京卫戍区司令陈铭枢都打伤了。

我正在读初中，当然去不了南京，和同学们一起到汕头市政府集会请愿，要求政府抗日。

政府面对学生的抗日要求根本不做正面的答复，只是一味地说你们好好读书，抗日的问题由政府考虑。他们这是在敷衍，如此一来，发生冲突，我们要求见高级行政官员。出来的人极力阻止，我们也不让步，就往市党部里冲，结果一冲就冲进去了。当然，市党部里根本就没有能说话算数的人，他们早就跑了，我们这些学生就把市党部砸了。

等到我们抗议完了，回到学校，学校要处理领头请愿的学生，开除了10个同学。我也算领头的学生之一，但学校没有开除我，原因是我学习好。

我就不愿意了，我也参加了请愿，学校不能因为我学习好就不开除我。我不买他们这个账，申请退学，自动退学，以此表示抗议。

我们请愿集会要求抗日没有错，开除我们是学校的错，我退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了，30年代初期，学校方面也不是一味地压制学生的抗日情绪，墙上也有些大标语：“还我山河”、“勿忘国耻”，等等。

总之，从我少年时期开始，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反抗日本侵略基本上成为了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主旋律。在这个大环境下，许多学生成为了民族主义者。

后来我到厦门大学附中读书，大概有两年时间吧。

这个时期我除了学习，还是比较关心时政的，也读了一些进步书籍，主要是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

这时候，我也快20岁了，思考了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个国民党太腐败，搞得老百姓生活不好，还软弱无力，不去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但我就是个学生，我能做些什么呢？还真有点报国无门的意思。我想学医吧，将来当了医生，给看不起病的人治病不要钱或者少要钱。这是我的理想，那时候，我对共产党或者说共产主义还是处在非常朦胧的阶段，认识不到。

1935年初夏，我离开厦门，前往北平，就读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附记：

2003年4月19日，柯华和夫人张明一起来到汕头市第四中学，它的前身就是柯华当年就读的汕头市大中中学，受到了四中2000名师生的热烈欢迎。88岁的柯华很激动，他坐在“柯华大使母校演讲报告会”的大红标语下说：“我不是什么演讲，随便讲讲，哦，潮汕话忘记了……我长期在国外，把母校忘记了！”他用乡音幽默诙谐地说：“我13岁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在这里读书，75年前了，那是两个时代啊！当年的四中名叫‘大中’，是很有名的，很进步的，校长是从英国伦敦求学归来的郭应清，思想进步，聘请了一大批有名的教师。我能从事外交工作，得益于当时英文读得好，30年代，汕头是开放城市，店铺很多是英文，我走在路上就读英文，学得很快。后来考上燕京大学。”他还充满深情地挥笔题词：“怀念大中，远望四中”。

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

# 救亡·北平

. 1935年—1937年